

HONG SHAN WEN HUA GAI LUN

红山

文化

概论



◎ 于建设等 著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红山文化概论

HONG SHAN WEN HUA GAI LUN

©于建设等 著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山文化概论 / 于建设等著. — 赤峰: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8

ISBN978-7-5380-1748-9

I. 红… II. 于… III. 红山文化—概论 IV. K87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0945 号

红山文化概论

出版发行: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赤峰市红山区哈达街南一段 4 号

邮 编: 024000

电 话: 0476-8231924

出 版 人: 额敦桑布

责任编辑: 许占武

封面设计: 张立刚

印 刷: 赤峰市中正制作印务有限公司

字 数: 300 千

开 本: 787 × 1092 1/18

印 张: 13.5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目 录

绪 论	001
一 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史进程	001
二 红山文化的基本特征、考古学类型与分期	014
三 红山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价值和意义	022
第一章 红山诸文化历史概貌及其自然环境背景	025
一 红山诸文化的历史发展概貌	025
二 红山诸文化区域自然环境与古文化的关系	038
第二章 红山文化的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形态	052
一 红山文化的自然环境背景	052
二 红山文化的生产力水平	054
三 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	071
第三章 红山文化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	081
一 红山文化的社会结构	081
二 红山文化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089
三 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	094

第四章	红山文化的宗教信仰与祭祀活动·····	099
一	认知考古学及其在红山文化研究中的应用·····	099
二	红山文化的宗教信仰与崇拜·····	105
三	红山文化的祭祀活动与祭祀礼制的起源·····	131
第五章	红山文化玉器与玉礼制的发端·····	156
一	红山文化玉器研究概况·····	156
二	红山文化玉器的类型及特点·····	160
三	红山文化玉器的材质·····	177
四	红山文化玉器的功用·····	182
五	红山文化玉器与玉礼制的发端·····	198
第六章	红山文化在中华远古文明中的地位·····	207
一	红山文化的渊源与流向·····	207
二	红山文化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217
三	红山文化与中国北方文明的起源·····	224
四	西辽河流域早期文明起源的模式与道路·····	228
后 记	·····	238



绪 论

一 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史进程

1. 红山文化的始发现

在中国近代考古工作中,红山文化是在祖国北疆地区较早发现的一种史前文化遗存。红山文化的始发现,可上溯到中古时代以前。据唐朝编写的《晋书》记载,3世纪中期,当前燕政权的创立者在选择今朝阳市附近建立都城的时候,曾在宫城基址中掘出以玉璧组合为主的古老玉器,这些玉器一出土,即在环绕都城的山峰上,出现了两条盘绕缠斗的龙(是否为迄今广泛发现的C型玉龙,现已无法查清)。于是,鲜卑统治者就给新建的城池起了个名字——和龙城,只是当时的鲜卑统治者尚未知晓这就是“红山古玉”群属的遗物,仅仅将它们视为天降祚祐的征兆。而红山文化被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加以科学的发现、认识和研究,还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事情,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近代西方考古学技术、手段不断介入中国学界的直接结果。

1895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派遣,赴中国做人类学和考古学调查,并在热河省境内(今内蒙古东部地区),发现了一些史前文化遗址或遗迹,不过鸟居氏当时还未能对这些史前文化遗迹做出科学的

归纳与分析¹。1907年,鸟居龙藏夫妇再次来到今内蒙古东部地区,此次是应喀喇沁右翼郡王旗贡桑诺尔布亲王的聘请,来喀喇沁右翼郡王旗开办的崇正学堂任教。此间,鸟居氏夫妇利用业余时间,详细考察了喀喇沁旗、赤峰和林西县等地,共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60余处,并在今赤峰市红山区东北部的红山主峰北部发现大片史前文化遗存,采集到大批陶器、大型石器与细石器 etc 等遗物。鸟居氏还把此次发现所得的细石器石镞命名为“蒙古式石镞”,说明他本人此时已经认识到红山周围古文化遗迹在古史时代的重要性。1914年,鸟居氏夫妇归国后,即用法文撰写了前后两次调查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考察报告,题名为《考古学民族学研究·东蒙古の原居民》²,发表在当年东京帝国大学的《科学杂志》上³。

鸟居氏的考古调查及其成果的公开发表,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从1919年起,法国神父桑志华也多次来到林西、赤峰及围场县等地进行考查,并在林西县发现了比较典型的细石器文化遗存⁴。1922年,桑志华又与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合作,对林西与朝阳县进行调查,又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存22处,其中10处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⁵。1924年,桑志华与德日进又发现了红山主峰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并采集到细石器、石耜等重要遗物⁶,发现了林西锅撑子山等细石器文化遗存。此外,1921年,受聘北洋政府农矿部地质调查所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加拿大人步达生,也在辽宁省锦西县(今葫芦岛市)发现砂锅屯洞穴遗迹,并进行了发掘⁷。这一发现揭示了砂锅屯洞穴遗址的基本面貌:该遗址以

- 1 [日]鸟居龙藏:《蒙古旅行》,博文馆,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另见《鸟居龙藏全集》第五卷,朝日新闻社,1976年。
- 2 参见[日]鸟居龙藏:《考古学民族学研究·东蒙古の原居民》,载《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纪要》第三十六册第四编。另见《鸟居龙藏全集》第五卷,朝日新闻社,1976年。
- 3 [日]水野清一:《满蒙新石器时代要论》,《考古学》第五卷第八号。转引自李少兵、索秀芬:“建国前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第94页。
- 4 [法]桑志华:“关于天津北疆博物院之古生物学考古事业”,载《考古学论丛》卷2,第253页,似玉堂,1930年。
- 5 [法]桑志华:“关于天津北疆博物院之古生物学考古事业”,载《考古学论丛》卷2,第253页,似玉堂,1930年。里森特(桑志华):“天津北疆博物院に代表した新石器時代の遺迹”,《人类学杂志》第46卷第214号。转引自李少兵、索秀芬:“建国前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第94页。
- 6 转引自郭大顺:《红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5、31页。
- 7 [瑞典]安特生著,袁复礼译:《奉天锦西县砂锅屯洞穴层》,《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一册,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1923年4月。



墓葬为主,兼具祭祀性质,所出遗物属新石器时代(现已判明砂锅屯遗址的部分遗物,属后红山文化时期,即相当于红山文化系统的小河沿类型)¹。砂锅屯遗址是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史上第一次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也是赤峰红山后遗址发掘之前,认识红山文化遗存的主要考古发掘资料²。

1930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启动“东北考古计划”,主要目的是寻找与中原彩陶文化有关的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存。著名学者梁思永随即对热河省进行了考古调查,当年10月进入天山(今阿鲁科尔沁旗政府所在地)、林东(今巴林左旗政府所在地)、林西、经棚(今克什克腾旗政府所在地)、赤峰及围场、承德等地区,调查与复查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并在查不干庙、双井、陈家营子、赤峰城北(英金河北岸)、赤峰城东(英金河南岸)、赤峰城西北等地采集到大量陶片、大型石器和细石器遗物。在克什克腾旗陈家营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还采集到一种“很像没有彩绘的仰韶陶片”,还在赤峰城东到红山嘴之间的北沙窝和东沙窝进行调查,并与桑志华所著《天津北疆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时代遗物》图版中所见赤峰采集陶器相比较,认为“尤可注意的是仰韶式的彩陶”(即典型的红山文化彩陶遗物)³。梁思永进行的考古调查活动将赤峰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调查开始引入有机的理性思考与探索之中,可惜的是,因为次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军队完全侵占东北三省,遂使“东北考古计划”被无限期地搁置⁴。此后,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势力支持下,日本学界对今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1931年夏,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了由横尾安夫(人类学)、松泽动(地质学)、江上波夫(考古学)、竹内几之助(蒙古语)、田中周治(摄影)等5人组成的内蒙古考察组,由张家口出发,北上察哈尔,横穿锡林郭勒草原,翻越兴安岭,经过林西、白塔子、林东、通辽而至四平,从事新石器时代遗迹和遗物的探查,并在林西县西门外黄土台地上和县城南沙凹地发现了比较典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1 郭大顺:《红山文化》,第8页。

2 陈星灿:“安特生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早期研究——为纪念仰韶文化发现七十周年而作”,《华夏考古》,1991年第4期。

3 梁思永:“热河查不干庙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1935年),《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1936年8月,第1-67页。另见《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4 梁思永:“热河查不干庙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1935年),《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1936年8月,第1-67页。另见《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采集到大量陶器和石器¹。1933年,日本先后派出四批由考古学者组成的团队来赤峰考察。日本驻赤峰代领事牟田哲二将其在红山附近采集到的一批陶器、石器、青铜器等重要文物,赠给来赤峰访问的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考古教研室助教上治寅次郎,上治寅次郎随即调查红山附近的古文化遗存,并将这批文物运回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考古教研室,供师生及考古界人士鉴赏²。不久,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又派遣鸟取森男、金子键儿等对红山后遗址进行再调查。旋即又组成以德永重康为团长的“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研究团”来到赤峰,由其中负责人类学的八幡一郎对红山前遗址进行调查,并发掘了红山后的几座石棺墓³。1935年,由京都帝国大学滨田耕作博士主持,组成由东京大学教授赤崛英三博士、三上次男、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水野清一以及旅顺博物馆主事岛田贞彦、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三宅宗悦等人参加的考古发掘队,对赤峰红山后古文化遗址进行发掘,揭露出属于红山文化的两个遗址(赤峰第一期文化)和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赤峰第二期文化)的石棺墓地。出土了大量打制、磨制的细石器以及完整的可以复原的陶器(包括泥质红陶和彩陶器),还发掘出了一座比较完整的古代灶址。1938年,正式出版了此次考古调查的发掘报告——《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⁴。

此外,日本人八幡一郎、赤崛英三等还在朝阳、凌源、承德、兴隆、赤峰等地进行比较广泛的考古调查活动,先后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以及青铜时代的古文化遗址,采集到大量古文化遗物,并在赤峰大庙、朝阳二旗营子等地发现和采集到大量与红山文化族属相关的彩陶片⁵,从而使赤峰第一期文化(即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日渐清晰。

1 [日]江上波夫:“新石器时代的东南蒙古”,载《アジア文化史研究》(论考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史研究所,1967年。

2 赤峰市红山区地方志办公室、赤峰市红山区文化局编:《红山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3 [日]八幡一郎:《热河省北部の先史遗迹及遗物》,《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研究团报告》第六部第三编,凸版印刷株式会社,1940年。

4 [日]滨田耕作、水野清一:《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六册,东亚考古学会,1938年。

5 [日]八幡一郎:《热河省南部の先史时代遗迹及遗物》,《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研究团报告》第六部第一编,凸版印刷株式会社,1936年。[日]八幡一郎著,高贵华译:“朝阳附近新石器时代遗迹”,《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五期,1937年5月,第11-19页。



1942年,毕业于吉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史地系的佟柱臣,志愿到赤峰国高任教,并充分利用节假日在凌源、赤峰、承德等地进行田野调查活动,相继发现了诸多新石器时代遗迹,其中就包括当今著名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¹。

此间,国内外考古学界关于赤峰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现,还主要处于考古调查和积累资料阶段,即使有一些规模较大、相对集中的考古发掘工作,也因为对于赤峰地区古文化积累情况不明,或限于当时认识手段的限制等,都不能够做出比较有效的判别与界定,往往给出一些比较模糊的区分与命名,譬如赤峰第一期文化与第二期文化的划分即如此。而且,随着当时关于赤峰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不断增多,学界关于赤峰地区古文化遗址的具体认识,也往往囿于大家的成见而将之置于完全孤立或被分割开来的认识状态之中,譬如红山附近新石器时代遗址显示出的细石器与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并存的基本特征,之所以会遇到当时学界的普遍忽视,即因为鸟居氏等人曾经掀起细石器文化的探讨,而将细石器文化与新石器文化完全割裂开来²。因此,我们将自19世纪末期以来直到20世纪40年代,国内外学界关于赤峰地区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存的调查与区分工作归纳为“红山文化的始发现阶段”。

2. 关于红山文化的考古学认识与命名

早在1906年鸟居龙藏发现赤峰细石器文化遗址以来,国内外学界关于细石器文化的研究,就已经成为包括赤峰或内蒙古东部地区在内的史前文化研讨的热点话题。1930年,著名学者梁思永在发表山西省西阴村考古发掘报告时,曾经格外注意长城以北的相关考古问题,并将锦西砂锅屯洞穴遗址与西阴村遗址

1 佟柱臣:“凌源附近新石器时代之调查”,《热河》,满洲古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协会志第四辑考古资料编,1943年4月(日文);“凌源新石器时代遗迹考察”,《盛京时报》1943年6月13日、15日,第5版;“热河先史文化与赤峰红山”,《盛京时报》,1943年8月25-31日连载,第4版;“热河の先史遗迹”,《北方圈》第3卷4、5号,1944年;“赤峰附近新发现之汉前土城址与古长城”,《历史与考古》,1946年10月;《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2 李少兵、索秀芬:“建国前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第89-95页。自1906年,鸟居龙藏发现细石器文化遗址并提出了“蒙古细石器文化”的观点之后,日本学界比较长期地坚持了这一观点,如水野清一、江上波夫:《蒙古细石器文化》,《内蒙古长城地带》,《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一册,东京,1935年,第1-62页;水野清一:《满蒙新石器时代要论》,《考古学》第五卷第八号等。这种认识的误差,势必会影响到当时关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与区分的正确认识。

进行比较,寻找差异,开始注意到长城南北地带的文化接触与互动关系¹。20世纪40年代,裴文中又将中国细石器文化划分为四期,即札赉期、龙江期、林西期和赤峰期,并认为细石器文化是与欧洲连属的由西伯利亚南来的一支文化系统,它与另一支系统即以彩陶文化为代表的太平洋文化系统在各自区域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末期后,同时沿长城地带彼此接触,形成一种新的混合文化²,从而将细石器文化与赤峰及古代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裴文中还断定:日本学者提出的赤峰第一期文化与砂锅屯遗存同为彩陶与细石器共存的混合文化形态³。安志敏也认为林西期所代表的细石器文化发展形态,时间上晚于札赉期与龙江期,可能与赤峰期相同;内容上可划分为早、晚二期,其早期阶段即纯粹的细石器文化,经济形态以游牧狩猎为主,晚期阶段则形成新的混合文化,除仍保有游牧狩猎的经济因素外,还兼重农业并作为经济生产的重要补助手段⁴。安志敏还分析了砂锅屯洞穴遗址的具体层位,认为其可以划分为四期,一、二期分别与赤峰第一期文化、第二期文化相一致,三期则属于周末燕国文化,四期则对应于战国至辽金时期⁵。由此,赤峰地区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与考古学分期问题等逐渐清晰。学界已经对赤峰地区先史文化的具体内涵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因此,关于赤峰地区先史文化遗存的科学研究,也逐渐提到考古学科的发展议事日程上来。

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汪宇平来到赤峰,对赤峰红山及其附近进行调查。他在红山西南坡脚下的龙王庙平地上,发现了红陶片,在东西长60

1 郭大顺:《红山文化》,第11页。

2 裴文中:“中国细石器文化概说”,载《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135-142页。转引自李少兵、索秀芬:“建国前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第93页。

3 裴文中:“河套之史前文化”,《中央亚细亚》2卷,1943年第2期,第10-19页;“中国之彩陶文化”,《历史与考古》,1946年第1期,第2-10页;“中国细石器文化概说”,《燕京学报》,1947年第33期,第1-6页。转引自李少兵、索秀芬:“建国前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第93页。

4 安志敏:“中国石器之农业”,《燕京社会科学》第二卷,1949年。转引自李少兵、索秀芬:“建国前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第93页。

5 安志敏:“砂锅屯洞穴层位之研究”,《燕京学报》,1949年第36期。又见《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162页。转引自李少兵、索秀芬:“建国前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第93页。



米,高 1.5 米的文化层中发现大量红陶片和石斧,又在红山附近东园子村东北台地上,发现红褐色陶片及少量彩陶片和石斧¹。1955 年,在梁思永的建议下,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在其出版的《新石器时代》一书中,专门列出分析红山后遗址的具体章节,并得出具体结论:“红山后的这一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即红山后第二住地的遗址)具有突出的特点。对于研究长城以北和以南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的相互关系问题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就这一新石器时代遗址(赤峰红山后)陶器的特征加以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新石器的文化遗存含有长城以北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在陶器上的特点,同时,也含有长城以南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的着色陶器的特点。因之,我们可以说,这种文化似应为长城南北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相互影响之后的新型的文化遗存”,并建议将红山后第一期文化遗存命名为“红山文化”²。1956 年 7 月,裴文中、吕遵谔率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对红山前三个地点、红山后石棺墓地及北大沟遗址等进行教学发掘。这是由中国学者首次主持的红山后遗址发掘工作。通过这次发掘,进一步明确了所谓赤峰第一期文化遗存的基本性质,并正式使用了“红山文化”这一考古学文化称谓³。

20 世纪 60 年代,考古工作者继续调查和认识包括细石器文化在内的红山文化的具体分布状况⁴,并依据这类遗存普遍缺少原生地层的基本情况,提出可以在“细石器文化”序列中划分不同考古学文化类型的研究方法,认为“昭盟(今赤峰地区)细石器文化可以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类型以林西锅撑子山为代表;第二类型以赤峰红山下层为代表,彩陶的制法、质地和一部分器形与花纹同仰韶文化的彩陶近似,说明这两个文化有一定的关系”。⁵考古学界针对细石器文化的分布特点,相继撰写大量文章进行探讨,如佟柱臣的《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

1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组:“内蒙古昭乌达盟赤峰红山细石器文化遗址调查”,《考古通讯》,1956 年第 4 期。

2 尹达:“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载《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5 年版。

3 吕遵谔:“内蒙赤峰红山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58 年第 3 期,第 25-40 页。

4 内蒙古文化局文物工作组:“内蒙古昭乌达盟赤峰红山细石器文化遗址调查”,《考古通讯》,1956 年第 4 期。

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载《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 1961 年版。转引自郭大顺:《红山文化》,第 13 页。

分期》¹，江上波夫的《新石器时代的东南蒙古》²，郑绍宗的《有关河北长城区域的原始文化类型的讨论》³，尹达的《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⁴等。1963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徐光冀等，在前人调查的基础上，发掘了赤峰市区北部边缘的蜘蛛山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战国—汉初四种文化的堆积层，明确了四种文化的相对年代。这是第一次明确发现的红山文化原生地层与其他砂锅考古文化在地层上的时代早晚关系⁵。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刘观民等，又在西水泉遗址发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灰坑打破红山文化地层，明确了红山文化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并在红山文化层发现半地穴式房址和数量较多的陶、石、骨、蚌器，尤其是在陶器群中破天荒地发现泥质褐陶妇女小塑像⁶。

总之，考古工作者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有目的地发掘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遗址、赤峰蜘蛛山遗址、西水泉遗址等，不仅发现了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房址、窖穴遗迹，还发现了具有确切地层关系的文化遗物，极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具体内涵，从而概括出红山文化的基本特色，即细石器与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细石器与彩陶共存以及石器与玉器共存的基本特点⁷。此间，考古工作者又相继发掘了赤峰市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⁸、金龟山遗址⁹、南杨家营子遗址等¹⁰。其中新发现的富河文化，就是从笼统的“细石器文化”序列中区分

1 佟柱臣：“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61年第10期，第557—567页。

2 [日]江上波夫：“新石器时代的东南蒙古”，载《アジア文化史研究》（论考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史研究所1967年版。

3 郑绍宗：“有关河北长城区域原始文化类型的讨论”，《考古》，1962年第12期，第658—671页。

4 尹达：“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修订版。

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第215—242页。

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第183—197页。

7 张星德：《红山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第1—5页。

9 徐光冀：“乌尔吉木伦河流域的三种史前文化”，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83—86页。

10 徐光冀：“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载《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180页。



出的又一类型的考古学文化¹,并在杨家营子遗址发掘的基础上,确认富河文化晚于红山文化的地层关系,在金龟山遗址发现早于红山文化的金龟山一期遗存(即后来发现的兴隆洼文化类型)。

3. 红山文化的整体大发现与考古学谱系的基本建立

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就是发掘与确认了时代稍晚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类型,并完全探明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南越燕山山麓,西抵张家口地区,东达哲里木盟科尔沁草原腹地,北至兴安岭南麓。还通过红山文化玉龙的发现和墓葬的发掘,辨识出具有典型红山文化特征的古代玉器群落²。

1973年,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瓦房村发现红山文化墓地³。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胡头沟村发现被山洪冲毁的石棺墓,出土玉器多件,经过考古工作者的清理发掘,又出土玉器、泥质红陶筒形器、泥质红陶无底钵形器等随葬文物若干件⁴。同年,在赤峰市敖汉旗三道湾子村和四棱山遗址相继发现红山文化窑穴和陶窑遗址⁵,并进行发掘清理工作。同时,考古工作者又对奈曼旗沿安乡满德图遗址进行发掘,获得红山文化石、玉、骨、蚌、陶等不同质料的遗物1300多件,并得知该遗址的灰褐色灰层就是红山文化的遗物包含层。1976年,在巴林左旗十三敖包乡刘家屯东坡地上,发现1件红山文化玉兽玦⁶。1978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调查迁安县城东北安新庄遗址时,发现了红山文化中少见的磨光黑陶、圈足器和指甲纹、几何形纹陶片⁷。1977年,在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石棚山发现后红山文化墓地,相继清理和发掘古墓葬160座,出土陶器200余件,石器100余件,装饰品近百件⁸。1979年,在辽宁省凌源县三官甸子遗址,揭露出红山文化墓葬三

1 徐光冀:“乌尔吉木伦河流域的三种史前文化”,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83-86页。

2 李少兵、索秀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史”,载《边疆考古研究》第5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3 张星德:《红山文化研究》,第3页。

4 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第1-6页。

5 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敖汉旗文化馆:“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第1-21页。

6 王未想:“巴林左旗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1期,第14-15页。

7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安新庄新石器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学集刊》第4集,1984年,第96-110页。

8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座,房址一座,出土玉器 11 件、石器 17 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砂褐陶、夹砂红陶等陶片 3000 余件¹;同年,在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村,发现红山文化祭祀建筑群址,先后发掘面积 2250 平方米,出土泥质红陶片、彩陶片、之字纹灰褐片、泥质黑陶片和打磨石器、骨器、玉饰、石饰、陶塑人像等²。该遗址经碳 14 测定年代数据,为 5485 ± 110 年,约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³。

20 世纪 80 年代,红山文化考古的重大收获,就是代表红山文化中晚期基本发展状态的“坛、庙、冢”遗迹的相继揭露,以及所谓“红山诸文化”发展序列的谱系关系逐渐明确。1981 年,在巴林右旗那斯台红山文化遗址,先后采集和征集到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和石雕等遗物⁴。同时,在克什克腾旗新井乡上店村发现小河沿文化墓葬两座,出土一批陶器和装饰件以及夹砂红陶罐、夹砂褐陶盆、石磨盘等器物残片,而且,上店遗址明显早于敖汉旗四棱山南台地、石羊石虎山、翁牛特旗石棚山等小河沿文化遗址⁵,其陶器与石器制作技术也有差别,主要显示出时代和地域上的差异特点⁶。1983 年,在辽宁省法库县境内又相继发现叶茂台、羊泉、王家店等较为典型的红山文化遗址⁷。1983—1985 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古代文化遗迹点十余处,其中包括祭祀址和墓葬群,相继发掘积石冢群与神庙遗址,出土随葬玉器⁸、建筑构件、泥

- 1 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6 年 6 期,第 497、510 页。
- 2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介”,载《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文集》,共青团辽宁省委机关印刷厂 1983 年印制;“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 11 期,第 1—11 页;“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 年),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 3 北京大学考古系碳 14 实验室:“碳 14 测定测定报告(六)”,《文物》,1984 年第 4 期。
- 4 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 年第 6 期,第 507—518 页。
- 5 克什克腾旗博物馆:“克什克腾旗上店小河沿文化墓地及遗址调查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 年第 1、2 期合刊,第 77—83 页。
- 6 索秀芬、李少兵:“克什克腾旗上店遗址及墓地的再认识”,《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 年第 2 期,第 27—31 页。
- 7 许志国:“法库县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辽海文物学刊》,1996 年第 1 期,第 42—50 页。
- 8 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 年第 6 期,第 18—24 页。



塑造像、陶制祭器等多件¹。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等在敖汉旗进行文物普查时,在宝国吐乡兴隆洼遗址发现一种厚胎夹砂陶罐及陶钵残片,上饰压印复合纹饰,不同于已知考古学文化的同类陶器。为了解决这类遗存的文化性质、年代及与已知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等于1983-1986年对该遗址先后进行4次发掘,清理房址60余间,获得一批陶器、石器、骨器、动物骨骼与植物果实等实物资料。从而区分出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兴隆洼文化²。这是一种在年代关系上明显早于红山文化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等又在敖汉旗新惠镇东北赵宝沟遗址,采集到一些以压印几何纹为主要特征的夹砂黄褐陶和夹细砂黑陶残片,其特征同样不同于已知的考古学文化。为了搞清其文化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于1986年夏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揭露面积达9万平方米,发现半地穴房址80余座,共清理房址17座、灶址1个、灰坑5个和石头堆遗迹1处,获得一批十分重要的古文化遗物,陶器表面多种多样的几何形纹饰,尤其是具有抽象特点的动物图案更显得独具特色³,故被命名为赵宝沟文化。这又是一种分布于赤峰市境内而在时间关系上早于红山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又在翁牛特旗广德公乡发掘一处赵宝沟文化类型居住址,出土筒形器、尊形器、红陶钵以及玉、石玦、蚌、石串珠、泥塑人面像和大型磨制石器等多件⁴。目前已经逐渐清楚,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以及夏家店下层等,它们之间确实体现出不同时代的发展特征,在时间关系上有着前后不同的发展顺序,但在具体内涵上也体现出比较浓厚的嬗替与传承关系。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6期,第1-17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0期,第865-873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1期,第1-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敖汉赵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五十二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4 刘晋祥:“翁牛特旗小善德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页。

这一阶段,以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为指导,全面进行文物普查,大规模发掘遗址,建立辽西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展开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和探讨文明起源等¹。1981—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与赤峰市敖汉旗博物馆对敖汉旗全境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发现遗址3409处,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址623处,红山文化遗址502处²。

20世纪90年代,红山文化已经成为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探讨和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寻根研究等方面都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而关于红山文化以及赤峰地区古代文化传统探源工程的考古学发现,也逐渐地增多。199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克什克腾旗境内完成白音长汗遗址发掘工作,揭露面积达7264.3平方米,又相继发现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等五个时期七个类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³;又在巴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房址15座、灰坑171座,出土大量陶、石、骨器等⁴。同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牛河梁第二地点1号积石冢东侧、北侧外墙及内墙,并在内外墙之间发现一排彩陶筒形器,仍保持原位并非立置,彩绘纹饰面向外侧,共掘得60余件;在积石冢的中部清理墓葬4座,出土玉器组合有环、璧、箍形器、勾云形玉佩、串珠等。此次发掘为了解积石冢的整体结构、随葬品的排列摆放提供了新资料⁵。1992年,在巴林右旗沙布尔台苏木查干敖包村西北沙坑内,发现一件红山文化鸟形玉器,并采集到泥质红陶黑彩、夹砂红陶、夹砂褐陶片,纹饰有压印之字纹、指甲纹、印席纹等,以及石耜、磨盘、磨棒、石斧、石刀、柱状石核、梯形剖面

-
- 1 李少兵、索秀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史”,载《边疆考古研究》第5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年第1期,第65—80页。
 - 2 邵国田:“概述敖汉旗的红山文化遗址分布”,载《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97—102页;“我旗五十年来考古综述”,《敖汉文博》第15期,1997年8月18日。
 - 3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下册),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 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巴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112页;张景明:“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细石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
 - 5 朱达:“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年),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178页。